



**雷颐简介:**1956年生于湖北武汉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。主要著作:《历史的裂缝》《时空游走:历史与现实的对话》《历史的进退》《被延误的现代化》。翻译文集有《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》《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》《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:王韬与晚清改革》(与人合译)

雷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。从20多年的学术研究中,他体会到,历史是一面镜子,它会让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变得更深刻,他的多篇文风犀利、与现实密切相关,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。2009年初,他出版了《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》,以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转折与信函为切入点,进行了目光独到的解读。之后又相继推出《历史的裂缝》《历史的进退》,以一个史学研究者的独特眼光重新梳理近现代史。近日,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——  
晚报记者 尚新娇

## 雷颐:以史为镜观照当今社会

### 一年改换三种角色:

#### 军人、工人、大学生

雷颐有在河南生活的经历。当记者拨通他的电话,告诉他郑州晚报想做他的专访时,他脱口问道:“晚报还是在陇海路上吗?”这一句话道出了他“老郑州”的身份。

他告诉记者,他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郑州度过的,时间是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。小学就读的是文化路二小,中学是现在的河南省实验中学。小学时的印象比较好,因为家境比较优越,在班上成绩也好,讨老师喜欢。中学没学什么文化课。

谈起经历,他感触颇深:“我下乡4年,接着去当兵,在江西和福建做空军地勤。几年后复员到河南平顶山,在那里一个工厂当车工。1978年很重要,是社会的大转折时期,国家高考政策恢复,我参加了高考,顺利考上了大学。可以这么说,那一年我的身份发生了3次改变。前3个月我是军人,尚未复员。中间6个月,我是工人,最后几个月我已经是大学生了。一个人的命运紧紧和国家联系在一起。”

“回想起来,人生充满变数与动荡。我们作为普通人无能无力,只能咬牙坚持,应对,做一些准备。一旦机会来临,命运就可能发生改变。我在下乡的那段岁月里,精神也很痛苦,但我一直没中断学习,看了好多书。绝没有想到以后还能考上大学。像我们那代人多数都没认真读过什么书,我在同龄人中看书最多。”

### 书写历史:

#### 寻觅档案之外的“另一个”

雷颐一再强调,关于历史,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

他举了一个例子:作家梁晓声曾经写过,在以前的那个艰难岁月,他们家因为受了一位阿姨的特殊照顾,每月多了几斤豆腐票,可以解决些他们的吃饭问题。以至后来回忆起来还对他们的这位“恩人”感激得不得了。这些平凡中的小事对于学历史的人来说,能从中读出一种历史感。现在来看,都是小事,有和无只是一点点的差距,好像比不上奔驰和自行车的差距大,但对一家人的生命和健康,奔驰和自行车的差距比不上当年一个月的半斤粮食、几斤豆腐。

“1971年我到河南叶县下乡后,对农村、对社会有了更多真实的了解,身上逐渐去掉了学生气。在农村,我看到了农民的生活之苦。有些知青看看也许不以为然,并未留意这些现象,我却一直在思考,这段经历对于我后来的历史研究非常重要。”

### 说晚清人物:

#### 从现代角度重新审视

近年,雷颐所著《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》引起极大反响,这本书将李鸿章置于晚清社会大背景之下,剖析了李鸿章与晚清王朝的命运纠葛,揭示了其内心世界,为人们认识晚清社会与李鸿章提供了独到视角。

从1862年到1901年,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下《辛丑条约》后病逝,这40年李鸿章一直处于权力的中心,他试图为晚清进行改良,却屡次失败。

雷颐说:“李鸿章这个人圆滑、世故、老练,知人论事,外圆内方。他很了解官场,会做必要的妥协,自保又能办事,讲究技艺,善于周旋,但做事有底线。他不断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,是一个可以基本肯定的人。”

“清政府传统中没有外交观念。只有一个理藩院。清政府愚昧腐朽,骄傲自大,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,外国只有朝奉天国之理,没有外交之说,设外交部是违反传统。所以它只在南方任命了南洋大臣,在北方任命了北洋大臣。外国人到中国,只能跟南洋大臣、北洋大臣打交道。清政府认为这样才有面子。实际上等于把权力交给了地方政府,致使地方政府权力越来越大,李鸿章长期当北洋大臣,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,深谙其道。当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一切外交事宜只能依赖李鸿章,所以他的权力很大。”

关于清政府三大重臣“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”,历史对他们褒贬不一。雷颐这样评价3人:“首先,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曾是曾国藩的私人幕僚,他们之间有矛盾。但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,本着‘师夷长技以治夷’,他们有共同的目标。李鸿章比较圆滑,与曾国藩的关系保持得一向不错,表面很恭敬。左宗棠性情刚直,不够取巧,与曾国藩水火不容。而曾国藩和李鸿章可以联手商量很多事情。”

### 关于变革:

#### 被动不如主动

研究近代社会对现代化建设很有意义。雷颐在《被延误的现代化——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》谈到了主动变革与主动“现代化”的问题。一个王朝的主动变革与被动变革蕴藏着许多机遇与错失。

“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,主动变革。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,如果我们熟悉近代历史,熟知晚清的命运,以史为鉴,我们主动变革的愿望就会更强烈一些,变革中的阻碍就会少一些。”

“清王朝在刚开始变革时,也有很大阻碍,电线、电报、铁路在引进修建时人们的争

议很大,表示强烈反对,认为是‘以敌为师’,‘被夷化’,反对的声浪很高。改革难度很大,要经过长期的观察,判断。当时林则徐提出了著名的观点‘师夷长技以制夷’。我们在改革中也进行过讨论,关于姓‘社’还是姓‘资’后人看来很容易的事,当时面临的阻碍是相当大的。”

雷颐在其撰写的《中国现代的“华夏中心观”与“民族主义”》一文中认为,对正处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,现在更为重要的是汲取其他文明中有益的东西(不是对抗,不是简单说“不”),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制度文化,不必担心因此会被“他者”所“化”。他说:“保守思想严重,会导致社会腐败不堪,对全社会的损失将会很大。所以体制改革十分重要。”

### 90年前的事情:

#### 今天仍有借鉴意义

遗忘好像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。战争、饥饿曾经那么残忍深刻地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。但随着时代的更迭,人们更喜欢选择遗忘麻木,出现这种普众心理的原因是什么,雷颐有自己的深刻认识:“每个人都会记住什么,遗忘什么。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,让你记住什么,遗忘什么,往往是受到主流掌控。我们为了不重蹈覆辙,需要保持记忆,与遗忘抗争。”雷颐对历史的书写与挖掘,恰恰做到了这点,提醒人们的记忆,使国民鞭挞自身,保持清醒和奋进,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责任。“所以我说,不能光看文本,文本不完全是真实的,要看民间的东西,民间的诉说。”

雷颐说,历史总在重复,比如清政府官办与商办这种产权不明的企业,结合我国企业改制此类问题很普遍,如何避免历史的重复?只能认真识别把关,避免历史的重复。

### “第二故乡”河南:

#### 期待文化教育的繁荣

雷颐经常出差到河南或路过河南,对自己青少年曾生活过的地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谈起对第二故乡的印象,以及今后河南的发展,他流露出深深的期许:“我觉得河南现在变化比较大。河南是中原文化,历史悠久,古代文化灿烂厚重,比如宋都开封。南宋以后,政治经济中心向南移,河南慢慢成了落后保守的代名词。不过,现在河南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位置一直往前移,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上有很大进步。虽然是农业大省,但商业也很发达。持续发展下去,会更加令人刮目相看。”

“与全国先进的省份相比,一流的大学河南始终没有。文化、教育也需要一些条件的保证。一是物质保证,二是允许学术的百家争鸣,百花齐放。广东在某些方面就非常开放,蓬蓬勃勃,在开放度与活力方面已经超过上海。还有湖南卫视,比北京、上海相比要强得多,但湖南的经济却不能与北京、上海相比,说明文化并不是完全由经济决定的。河南应该制定更加宽松的政策,以此推动文化教育的繁荣。”

